

本是同根生 枝叶异时荣

——话说大小乘佛教起源先后问题

张爱林

人类的文化和历史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从文化的观念及生活样式的冲突，到历史意识形态与宗派乃至国家的战争，往往发轫于宗教，至少有宗教问题推波助澜。基督教的分裂曾经使邻居乃至亲人都成为仇敌，即使以和平理念著称的佛教似乎也难逃如此的宿命。宗教以情感信仰为支撑，似乎更容易以妄想煽动激情，从而被别有用心者利用。佛教本来以消除众生的执著心，获得终极解脱为修行目的，但在其发展史上，执著却起着重要作用，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小乘的纷争。在纷争中，大小乘经典的产生先后与合法性问题成为焦点。

“原始佛教”这个词，已经成为当前学者乃至出家人谈论佛教发展史的重要概念。“原始佛教”这个词在大小乘行者口中说出的意味是不同的，小乘行者的“原始”多是意味着自己“正宗”，因为他们历来坚持大乘非佛说。大乘行者为了避免自大的嫌疑，“原始”只是意味着“早期”，是刚刚萌芽而非究竟成熟的意味，因此认为是佛的不了义说。小乘佛教一般指以修行四谛、缘起法为主，成就阿罗汉果为究竟的佛教理论和实践系统，主要的经典依据是《阿含经》。“原始佛教”主要指部派分裂以前的佛教，佛教分裂为部派后，上座部认为自己是正统，是原汁原味的佛教，而大众部以及以后形成规模的大乘佛教掺杂了大量外道的成分，已经变种，甚至根本就是外道。有的也认为大乘佛教兴起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，晚于小乘，很多大乘经典是后来编撰甚至杜撰的，甚至认为有些重要的经典，如北传的《大般涅槃经》等也

疑为非佛说。

大小乘观念上的分歧不是用“原始佛教”一词安慰一下宗教感情就可以弥合的。《从大乘经典》的记载很容易发现，佛在讲大乘法的时候往往与小乘法作比较来说明大乘法的优越性。南传佛教在讲法的时候往往也指责北传大乘佛教的不是，大小乘佛教理论上的冲突仍然还存在。幸好的是，理性的发展或多或少已经削弱了意气之争，至少可以求同存异。中国和斯里兰卡互派佛教留学生，斯里兰卡佛教界来参加中国举办的世界佛教大会，这些都是大小乘交流的可喜现象。

从大小乘分歧的根源上说，大乘行者的“自大”不是根本问题。至少大乘佛教承认小乘经典是佛说，认为大小乘是同气连枝的，甚至现在一些修行大乘的僧人和在家学佛的居士，纷纷以能够读懂《阿含经》为荣。而小乘佛教一般还是认为大乘非佛说，至少是不纯粹的，把大乘佛教排斥于外。大小乘佛教的对话是佛教内部对话，还是佛教与外部的对话？双方明显在根本划界上存在差异，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又是大乘经典的合理性问题。

主张大乘经典非佛说的一般认为，大乘学派形成较晚，且大乘经典在早期佛教历史中未见记载。历史的演变不能说明教法本身的缘起，只能说明教派弘化开来的机缘与群众基础不同而已。

大乘佛教认为，大乘经典的产生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。大乘佛教修行者一般认为，大小乘佛教都是佛的正法，是佛陀为不同根性和机缘的众生而说，在起源上并无先后。况且从大

乘经典的记载看，佛所说的多数大乘法不是在人间，而在天上，或者在凡人不能入的地方，比如佛初成道时在天宫说《华严经》，在楞伽山说《楞伽经》，而《大般若经》有一些在人间说，一些在天上说，说法的对象多为菩萨。这种说法所蕴含的逻辑基础是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，这是大小乘佛教都承认的理论前提，而且大小乘佛教都认为佛陀是三界教主，人天之师，那么，佛说法的对象自然不只是人。抛开宗教事实无法判断外，这种推论在逻辑上并没有问题。

至于为什么小乘行者中没有听说过大乘经典，大乘人认为，理由很简单，佛应机说法，大乘法所对应的是大乘根器的众生，对小乘根器者是不讲的，即使其有机缘听到也会回避。比如《妙法莲华经》中记载，佛开始说法时发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征象，小乘修行者看苗头不对纷纷退席。因此大乘经典不是佛没有说，只是不适合对小乘人讲，或者他们自己不想听，想听的都回小向大了，譬如佛的十大弟子开始都是修行小乘法并证得阿罗汉的圣者，后来都转向了菩萨道。大小乘教法虽然同时宣扬，但起初教化的是小乘根器成熟的弟子，大乘佛法没有被广泛接收和弘扬。

大乘佛教认为大乘佛教的出现和大乘佛经的集结并不比小乘三藏晚，只是参与者不同罢了。如世亲撰的《金刚仙论》认为，佛在这个世界的铁围山外说法，无量诸佛来集。结集大乘法藏的时候，罗汉和大菩萨也无量无数，大乘三藏经典并不是几个人结集的，也不是在历史流变中创造出来的。当然这种宗教事实无法用普通经验事实来证实或者否定。

那么为什么佛在世时不广说大乘，伽叶阿难等阿罗汉结集三藏时一并结集呢？龙树在《大智度论·释嘱累品》给出的理由是，大乘教法难信难行，佛在世的时候都有不信的，何况佛陀涅槃后呢？而且，大乘三藏无量无限，多存于龙王阿修罗王诸天宫中，有千亿万偈之多。因此诸天龙神寿命长久，识念力强。而世人寿命短促，识念力薄，只能记诵极其有限的佛

经。按照大乘佛教的佛陀观，佛非但以一身说法，无量世中变化作无数身，所说法也无量。对于为什么结集小乘经典的时候，同是阿难参与的结集，为什么他没有对小乘人提大乘经典呢？龙树认为，《阿含经》集结的同时，文殊弥勒等大菩萨，也让阿难一起来集大乘，因为阿难考虑众生志业大小，不在声闻人中说大乘，如果说的话会造成观念错乱，连小乘法也修不成了。

逻辑上的合理性并不说明事实如此，大乘经典多数带有“空降”的因素，空降因素是宗教事实，如果凭信仰肯定它，是出于信念，而仅仅凭猜测或有限的普通认知否定它则是独断。宗教事实无法用普通经验来证实，也不能用普通经验来否定它。不予采纳而悬置是一种可取的做法，既可以避免犯独断的错误，又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有些人乘机装神弄鬼。经验不能证明的东西并不排除其存在的逻辑可能性。

从文献记载看，《阿含经》有关大乘和菩萨的记载不少。《长阿含经》卷第二之二第一分游行经之第二初云：“大乘道之舆，一切渡天人”。《杂阿含》之七六九云：“阿难，我正法律乘、天乘、婆罗门乘、大乘……。能调伏烦恼军者，谓八正道：正见乃至正定。阿难，是名正法律乘、天乘、梵乘、大乘”。《阿含经》也在多处提到菩萨，如《增一阿含经》卷第一说到弥勒菩萨、六度等内容：“弥勒称善快哉说，诸法义合宜配之，更有诸法宜分部，世尊所说各各异，菩萨发意趣大乘，如来说此种种别，人尊说六度无极，布施持戒忍精进，禅智慧力如月初，速度无极睹诸法”。《增一阿含经》卷第十之八云：“勇猛有所伏，求于大乘行”。“小乘”字样也见于《阿含经》，如《增一阿含经》卷第十八之九：“舍利弗当知，如来说四不可思议事，非小乘所能知”。《阿含经》也多次提到声闻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三乘之道，如《增一阿含》卷十六、卷二十、卷四十五等都有明示。“菩萨”一词在阿含经典中更广泛，在《长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广说贤劫诸佛及其为菩萨时的事迹。《长阿含经》卷第五亦

云：“如来往昔为菩萨时，在所生处聪明多智”。多部《阿含经》都提到弥勒菩萨的故事，如《中阿含王相应品说本经》第二，《增一阿含》的卷一、卷十九、卷四十四等。可以说，四部阿含都有大乘佛法的相关内容。现在斯里兰卡南传巴利语三藏中《小部》的《本行藏》收集的三十五个本生故事，即菩萨各种波罗蜜行的事迹，与汉文经典中《六度集经》等菩萨本缘的内容相似。

认为大乘佛教从大众部分化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，据《大唐西域记》等记载，上座部中也分大小乘。绝大多数学者认为，只有小乘才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，由此衍变成十八部或二十部，大乘是不分上座部和大众部的。从有关文献记载看，上座部并不只是小乘，大乘也有上座部。《大唐西域记》多次提到“大乘上座部”，如卷八载：“摩诃菩提僧伽蓝僧徒减千人，习学大乘上座部法”，《续高僧传》卷四（玄奘传）和《释伽方志》也沿袭使用了“大乘上座部”，如《释迦方志》下说羯陵伽国“寺十余，僧徒五百余人，大乘上座部。”但对什么是“大乘上座部”无明文解释。摩诃菩提僧伽蓝是僧伽罗国（锡兰，现在的斯里兰卡）王以重宝献印度王在那里建立的，而僧伽罗国开始尊奉大乘上座部。如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一载，僧伽罗国开始唯宗淫祀，佛去世后第一百年，阿育王的弟弟摩醯因陀罗来到这里，弘宣正法，从此以后佛教日盛，主要遵行的是“大乘上座部法”。后

二百余年分成二部：一部是摩诃毘诃罗住部，排斥大乘修习小乘；一部是阿跋邪祇厘住部，同时修习大小乘佛法。可见，玄奘认为锡兰佛教开始就是大乘上座部，后来才分裂的。

锡兰佛教史文献《大史》认为，起初以摩诃迦叶为首的大长老们进行的正确结集，被称为上座部结集。在最初的一百年中，只有上座部一派，以后才逐渐产生了其他的学派。参加第二次结集的长老们谴责的恶比丘，共有一万人另外建立了名为大众部的学派。但《大史》中又记载，阿育王子摩晒陀是在锡兰传播佛教的第一人，他传来的也是阿育王化的佛教，这与玄奘法师的记载是一致的。玄奘之后，义净又去印度求学，写了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记载：“师子洲并皆上座。而大众斥焉。”可见，佛教传入锡兰时应该是以上座部为主，阿育王弟弟传入的当是大乘上座部。

现代出现的一些考古文献也说明大乘佛经的出现并不比小乘佛经晚。比如新疆出土的写于西晋元康六年（公元296年）的大乘经典《诸佛要集经》。据称日本佛教学者松田和信在巴米扬遗迹中发现包括了被认为是2至3世纪期间抄写的大乘佛教经典之一的《贤劫经》，经文抄写在椰树叶上，经书使用的是从北印度至中亚广泛使用的犍陀罗俗语。

大小乘佛教盛传的先后不能说明起源的早晚，逻辑合理性和历史证据表明，二者几乎同时形成具有更大的合理性。

“人类宗教与社会发展 心灵与世界公民”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

本刊讯 2008年6月23至24日，由香港教育学院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、香港教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主办，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协办的“人类宗教与社会发展：心灵与世界公民”学术研讨会在香港教育学院举行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、南京大学、上海社会科学院、山东大学、北京大学以及港澳地区学者、教界人士40余人出席会议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，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主任吴云贵、副主任周燮藩，香港教育学院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副总监王秉豪、陈贤冰以及巴哈伊教亚洲际顾问团委员罗兰、香港巴哈伊教总会主席方玉兰、澳门巴哈伊教总会主席江绍发等出席会议。会议收到论文20篇，围绕个人信仰与社会道德、灵性教育、宗教团体与基层社会服务、宗教与政治、宗教民族与国家、构建新世界秩序等主题展开研讨，与会者从各自学术研究领域阐明观点加以论证，不时引发热烈讨论和问答互动。此次研讨会是巴哈伊教专题研究系列会议之延续。（于光）